

匡亚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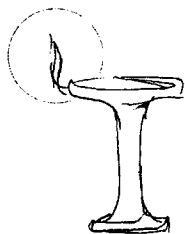
吴震 著

罗汝芳评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罗汝芳评传

吴震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汝芳评传/吴震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92-2

I. 罗… II. 吴… III. 罗汝芳(1515~1588)-评传
IV. 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170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罗汝芳评传

吴 震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8 字数 427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92-2

定价:76.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22页。



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1页。



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



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耄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前 言

自 16 世纪 20 年代以降,学术界的思想潮流由朱子学逐渐转向阳明学,心学思想几乎成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导向。半个世纪以后,即 16 世纪末叶的明代万历年间,学术界对阳明心学之历史流变(包括阳明学及其后学)开始有所批评和总结,比如管志道(号东溟,1536 ~ 1608),他将阳明后学中的王畿(号龙溪,1498 ~ 1583)和罗汝芳(号近溪,1515 ~ 1588)相提并论,对其思想流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语意中对王守仁(号阳明,1472 ~ 1529)、王艮(号心斋,1483 ~ 1541)亦不无微词,隐约指出“二溪”之过,责在阳明和心斋:

姚江(按,指阳明)以千载绝学标良知,泰州以兼善万世树孔帜,不无张皇之过焉。其学亦成章而上达矣,而极深研几之君子,以为终与暗然日章学鹄,尚隔一尘。及于龙溪、盱江(按,即近溪)二先生,概以博大圆通为教体,而堤防不密,门墙太滥,伪夫得以名利巢其中。谭及孔门鸣鼓之攻,过门之拒,似犹

嫌尼父之不广，而借出世之圆宗，以为解也。中有豪宕敏结之士，窥圆宗之一班者，辄取宗风扫孔矩，而吾复无以裁之。^①

这是以“博大圆通”来概括“二溪”之学的特征。所谓“堤防不密，门墙太滥”，盖指“二溪”张皇讲学、用世意识过强，从而导致在捍卫儒家道统、排斥异端邪说方面未免有所疏漏。至于二溪之思想何以“博大圆通”而又“堤防不密”，换言之，疏于对异端思想的严密防范，是否就是博大圆通之思想性格的必然结果，这里并没有深入涉及。

及至明末最晚出的一代大儒刘宗周（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1578～1645），他对阳明后学的流变以及晚明学术思想的状况更有深刻的切身体认和思想洞察，他注意到了龙溪和近溪的学术思想与阳明学之义理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并对“二溪”思想提出了批评：

然学阳明之学者，意不止于阳明也。读龙溪、近溪之书，时时不满其师说，而益启瞿昙之秘，举而归之师，渐跻阳明而禅矣。则生于二溪之后者，又可知矣。^②

这段话非常简洁扼要地点明了“二溪”之于阳明的思想关系，但似乎并没有受到后人的注意。相比之下，黄宗羲（号梨洲，

① 《惕若斋集》卷一《惕见二龙辨义》，明万历二十四年叙刻本，第60页上下。

② 《刘子全书》卷十九《答王金如》，清道光年间刻本，第31页下。



1610 ~ 1695) 有关泰州学派的一段评语则非常著名：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①

对照上述蕺山之言，显而易见，宗羲此说是承袭蕺山而来，只是将“近溪”改成了“泰州”，如此一来，便大大超出了蕺山的原意^②，而成为他自己的观点。不过，由蕺山之言而观，近溪究竟如何“启瞿昙之秘”，又究竟如何“跻阳明而禅”，语焉未详。有一点则是明确的：在蕺山眼里，能与龙溪并驾齐驱者，在阳明后学中，惟有近溪。

另外，刘蕺山通过对儒学历史的反省，针对晚明心学的思想状况提出了批评，进而再三强调了自己的以诚意为本的哲学主张，其中也隐约提到了近溪，尽管没有指名道姓。蕺山曰：

孔氏之言道也，约其旨曰“中庸”。……孟子起而言孔子之道以胜之，约其旨曰：“性善”。……又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

② 其实，蕺山之于心斋，并非持完全否定之态度，比如，他对心斋的格物说，便有所肯定，参见《刘子全书》卷十二《学言下》，第13页下。又说：“王门有心斋、龙溪，学皆超悟，世称二王。心斋言悟虽超旷，不离师门宗旨。”（《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第9页）所谓“不离师门宗旨”，这应当是蕺山对心斋的基本评价。由此以观黄宗羲对心斋及其泰州学之评价，显示出其与蕺山的观点有一定距离。



千余载，濂溪乃倡“无极”之说，其大旨见于《通书》，曰：“诚者，圣人之本。”可谓重下注脚，则吾道之一觉也。嗣后，辨说日繁，支离转甚，浸流而为词章训诂。于是阳明子起而救之以良知，一时唤醒沈迷如长夜之旦，则吾道之又一觉也。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蔽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虚玄，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知止之谓致良知，则阳明之本旨也。今之贼道者，非不知之患，而不致之患，不失之情识，则失之玄虚，皆坐不诚之病，而求之于意根者疏也。故学者以诚意为极则，而不虑之良于此起照。后觉之任，其在斯乎！^①

戴山的这段论述，辞约而意深，短短几百字，从孔子讲到自己，反映出其对思想历史有十分精到的把握。令人注意的是，从阳明的致良知到他的“以诚意为极则”的诚意说，其间的“争言良知”者之弊和“今之贼道者”之弊，都与“情识”和“玄虚”有关。他着重指出：“猖狂者”将情识视作良知，把一切现成的都说成良知的表现；“超洁者”津津乐道于虚无，把良知也看成是虚幻的。在戴山看来，导致这两种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求之于意根”，换言之，惟有用他的诚意之学才能从根本上纠正此类弊病，事实是否如此，这是另外一个义理问题，容当别论。那么，所谓“猖狂”和“超洁”或者说所谓“情识”和“玄虚”，又有何具体所指？

① 《刘子全书》卷六《证学杂解》，第13页下~14页下。



对于上述两段戴山之说,唐君毅有一综合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戴山的真意:

龙溪之论,是超此善恶通塞之相对,而只在一无善无恶之灵明上参究。罗近溪之论,是教人于不学不虑之赤子,与日用常行之生活中,随处见此天德良知之流行。……然依戴山之旨,以评二溪之学,则更可谓此龙溪之学,教人参究一无善无恶之灵明,即教人欣慕一虚空玄漠之境,而使人不脱欣厌心,此亦即致良知而“荡之以玄虚”也。至于近溪之教人于日用常行中,随处见天德良知,而不知人之日用常行,恒是真妄混糅,良知与情识,夹杂俱流。则此所见之天德良知,即成“参之以情识”之天德良知矣。总而言之,则二溪之学在戴山观之,皆“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儒,不免近禅”。近禅与否,可不论。然要可言龙溪近溪之学,原有其未足之处,而后有其流弊也。^①

这是说,“玄虚”之弊盖指龙溪,而“情识”之弊则是指近溪。理

①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470~471页。按,着重号原有。“启瞿昙之秘”之下,有一行注:《刘子全书》卷十九《答王金如》。另按,唐君毅对戴山通过批判二溪之学,从而提出“诚意”之论的内在思路,亦有具体入微的剖析,不妨录之,以备一参:“戴山之进于东林者,则在确定此善在此心中之存在地位,乃在于‘意’,而以此意为心之主宰,以为通贯此心之内外上下之定盘针。乃倡此一诚意之学,使人不只上欣一虚空玄漠之境,以厌世间;亦不于世间随处见天德流行,而必求去其伪而存其真。此意之当为心之主宰所在,则又固阳明之学之所涵,而亦为戴山以前之若干儒者,所同多少见及者也。”(同上书,第471页。按,着重号原有)



由是：龙溪以“无善无恶”为宗旨，教人直从本体上悟入良知之无的虚境，故而不免猖狂荡越而坠于“玄虚”；近溪以为天德良知恒时流行于日用常行之中，教人于日用中体证良知，故而不免将日常之情识误作本体之良知。应当说，唐君毅的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龙溪且不论，就近溪而言，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天德良知，确是近溪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过，就阳明后学的历史情景而言，其实所谓的“以情识为良知”类同于“以知觉为良知”，不待近溪之出现，早在阳明第一代大弟子之间，就曾围绕知觉与良知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辩。笔者曾在旧著中对此问题做过探讨^①，有兴趣者可以参阅，这里只略作提示。概而言之，所谓“以知觉为良知”，乃是王门学派中的“归寂派”对所谓“现成派”的一种批评。按照“归寂派”的代表人物聂豹（号双江，1487～1563）的观点，虚灵和知觉是良知的双重特征，虚灵是良知之本体，而知觉只是良知之作用，重要的是，在“体立而用自生”的原则之下，应当做到“立体以达其用”，而不能以为良知之流行、知觉之作用便是本体，如若不然，则不惟有可能“牵己以从，逐物而转”^②，从而丧失良知的主体性，甚至有可能导致“以见在为具足”、“以不犯做手为妙悟”，进而陷入“恣情玩意”、“猖狂荒谬”^③之窠臼。另一方面，在“现成派”的代表人物王龙溪那里，他坚持认

① 详见拙著《阳明后学研究》第三章“聂双江论”和第六章“欧阳南野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可以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四《答松江吴节推》，明刊云丘书院藏版，第60页上。

③ 可分别参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一《答王龙溪》，第3页上；同上书卷四《送王惟中归泉州序》，第5页上。

